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與人們一同追問：答劉紀蕙教授

Questioning with the People: In Response to Professor Joyce C.H. Liu

doi:10.6752/JCS.201003_(10).0014

文化研究, (10), 2010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0), 2010

作者/Author：子安宣邦(Koyasu Nobukuni);馮啓斌(Ci-Bin Fong)

頁數/Page：251-255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0/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3_\(10\).0014](http://dx.doi.org/10.6752/JCS.201003_(10).001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思想論壇

《文化研究》第十期（2010年春季）：251-255

與人們一同追問：答劉紀蕙教授

Questioning with the People:
In Response to Professor Joyce C.H. Liu

子安宣邦

KOYASU Nobukuni

馮啓斌 翻譯

Ci-Bin Fong

2008年11月28日，我在清華大學發表名為「近代日本的兩個倫理學」的演講時，由劉紀蕙教授擔任評論人，隨後於今年1月再次領受劉教授的書面提問。今年夏天7月時在東京會面，雖說是針對劉教授的提問直接談論的機會，然書面答覆延遲之責完全是我怠慢之故，僅能向劉教授致上歉意。我十分重視劉教授提出的重要質問和疑義，儘管回覆這些提問確實需要時間，可這也不過只是藉口。

藉著中日文翻譯，數次往復的議論實有意料之外的難度。面對劉教授的提問，我不免懷疑自己是否真的曾經說過那些話，因而必須再次對照我演講的原稿與翻譯的文章。雖有些隔靴搔癢之感，但我盡己所能透過對照我的原稿與中譯稿試著找出為什麼劉教授會提出那些問題，並在此基礎上回答這些疑問。

首先，我想修正劉教授將我視為倫理學專家的想法。確實我在就讀研究所時主修倫理學，當大學教師的最初兩年也教倫理學。然而那之後至今，我的研究工作完全屬於日本思想史的領域。70年代時我在思想上的關注和探究的方向與後結構主義重疊一事開始明朗，並達成在思想史方法論上的轉換。從80年代開始，我循著重省日本近代的觀點積極地在言論上介入現代思想問題，即為漢字論、國家神道、日本

民族主義、亞洲問題、近代的超克以及倫理問題等。因此，我所謂的倫理問題，並非直接從我專攻倫理學的經歷而來。所謂的倫理問題，是我盡力以言論介入現代思想問題的一部分。日本的倫理只不過是作為曾經專攻的項目故而略知該學科的內容，然而若將我視為倫理學專家，便會誤解我針對倫理問題所作的發言的用意。

當學生時的我的確曾經進入大學的倫理學研究室就讀，但那只不過是為了學習思想史的權宜之計。當時若想學習思想史，只能進入和哲郎所在的倫理學科或者丸山眞男所在的政治學科。我從學生時代開始，對倫理學這門學科便抱有嫌惡感，至今亦然。少年時期體驗過日本戰爭時期，有此感覺是理所當然的，因為所謂的倫理學，就是負有養成日本帝國國民的學問。是故，即使我的發言有針對倫理學的部分，也絕對沒有成就倫理學的目的。吾輩生存意義的問題、如何抱著希望活著等等問題應該視為每個人自己的問題來思考，我這麼說是為了希望的哲學，而非倫理學。所以我在演講的最後說：「如果從我們的思想遺產召喚出倫理學，乃是出於近代國家的邀請的話，那麼在最後我想說的是，我們也有權繼承那種不去召喚倫理學的思想遺產。從我們的思想遺產如何解讀出尚存活著的思想，還是打算與人們站在同一陣線，對於生命提出疑問的作為思想史家的我的課題。」

我深切地期盼這個結論能夠正確地翻譯、再次傳達給劉教授，他所提出的質問、疑問幾乎都是建立在這個結論的錯誤翻譯之上。我當時說「我們也有權繼承那種不去召喚倫理學的思想遺產。」，若依據先前翻譯的中文卻變成：「我們擁有繼承未召喚倫理學思想遺產之權利」。我說的是「我們擁有拒絕繼承召喚出倫理學的思想遺產之權利」。劉教授對我的質問、疑問似乎都被錯誤的翻譯引導。今年七月當面會談時，雙方產生歧見亦為錯誤翻譯之故。當然，誤譯也可歸因於我表達得不夠明確，故於此再次將我在結論裡陳述過的部分重新說明，希望不再有誤讀、誤解及錯誤翻譯，此為回覆劉教授的最佳方式。

我將倫理學這門學科視為近代的構成物，即使這門學科的內容與「倫理學」這個稱呼都是從過去的思想傳統中召喚出來也一樣。我

演講的題目是「近代日本的兩個倫理學」，指涉近代日本是由兩種倫理學所構成。其一是由ethics翻譯承繼而來的倫理學，另一個則是從儒家傳統中召喚、重新構成的倫理學。於日本明治時期學問及教育近代化過程中構成的學科分野中的倫理學，首先就是翻譯的倫理學，也就是說，首先成立的是稱作「倫理學」的這個翻譯過來的學問及其學名，是先成立了「倫理學」，之後「倫理」這個語彙和概念才成立。此事雖看似古怪但看來是事實，且這並不僅限於「倫理學」和「倫理」，近代「國家學」的導入、成立近代的「國家」概念也是如此。這種近代語彙與概念成立過程中的倒逆，是在接收先進文明時所導致的情況。當時，「倫理」這個漢語是否存於儒家傳統中是次要的問題。姑且不論新造出來的語彙，近代漢語幾乎是以既存漢語為前提、依此再生、轉化所作成的東西。東京帝大最早的日本人哲學教授井上哲次郎等人所編集的《哲學字彙》(1884)中，將「Ethics」的翻譯定為「倫理學」時，亦補注「禮樂記，通於倫理。又近思錄，正倫理，篤恩義」，雖已構成「倫理學」這個翻譯語彙，卻又從過去召喚出「倫理」一語轉用，亦即將之作為由翻譯的倫理學所構成的倫理，這同樣也是以近代來召喚過去的工作。這個翻譯的倫理學還促成了另一個倫理學的成立，也就是藉由從吾人的過去召喚出來的儒家傳統重構的倫理學，此為東洋倫理學或儒教倫理學，且這種倫理學主張「倫理」這個詞彙是我們固有之物，然而他們卻不知道這個「倫理」成為固有之物的過程，也同樣是來自近代對過去的召喚工程。劉教授對我提出關於「倫理」一詞的儒家固有起源的反駁，也同於前述那種召喚過去的工程。但從事召喚過去的人們，即使想在儒家經書中找尋「倫理」一詞的根源，也只能在〈樂記〉中找到一例，對此難道不感絕望嗎？設定翻譯詞彙「倫理學」的井上哲次郎也好、構成昭和時期人倫的倫理學的和哲郎也好，兩者也將〈樂記〉中的例子當作金科玉律般引用，但這個「倫理」明明也可能意指「人與事物的序理」。所謂「理」是指「玉石之條理」，劉教授自己不也這麼說嗎？即使是朱子在《四書集注》中，「倫理」這個詞連一次也沒使用。總之，這種對自己東洋的過去的召喚工程，是在接收到近代西洋的衝擊之後產生的反動(reaction)。

我認爲這兩個倫理學是在近代的需求下所構成。一個是由歐洲召喚過來，另一則從我們自己的過去召喚出來。特別是在近代日本中，倫理學係帶著強烈的國家的需求、作爲教育體系的中心理念被構築而成。這兩個倫理學在相互補充、分工合作的過程中，各自成形。我將翻譯的倫理學、也就是Ethics這個倫理學視爲帶有近代市民社會的個人倫理學特徵，是爲了強調這兩個倫理學之間有相互補充的情況。帝國日本也因爲將市民社會的形成視爲近代國家的要求而帶有前述特性。當然，近代國家的市民是國家的公民，Ethics的倫理學也無疑是在談國家的公民，劉教授也談到與王國維有關連的元良勇次郎，他被視爲具代表性公民倫理學教育者。然而關於日本和中國構成的近代倫理學言說，在評價上我和劉教授似乎有所分歧。

我在演講中說：「近代日本，倫理學乃是在國家制度上加諸於學生。這個倫理學把國民對倫理的發問，正確的生存方式的發問吸收於己側，並將解答與思考方式同時賦予學生。」(183)扮演啓蒙角色的學者們直接向人們闡釋在近代中必要的倫理主體形成，是在明治初期至1900年這段期間，初期的倫理學者大西祝(1864-1900)的《倫理學》中，我們僅能從中讀出這類積極的訊息。劉教授列舉、談論譚嗣同、羅振玉或王國維等人，此爲召喚中國的儒家傳統，在倫理學的形成上，應與近代日本有不同的要求與課題才是。我不打算將他們與日本的發表演說的倫理學者相提並論，這點與我不將福澤諭吉或大西祝與之後的倫理學者們等而視之是相同的。現在我所思考的是，將福澤帶給日本近代黎明期的激進主義(radicalism)於現代再一次以激進民主主義的形式復甦（福澤諭吉，《文明論之概略精讀》，岩波現代文庫），這是我之所以積極地重新閱讀福澤諭吉的用意。在此，問題已變成我們應當如何繼承自己的思想遺產。

我演講的最後以「如何從我們的思想遺產中找出生存的思想，這是作爲意圖與人們一同追問人之生存的思想史家如我的課題。」結束。這段話被譯成「從我們的思想遺產如何解讀出尚存活著的思想，這是打算與人們站在同一陣線，對於生命提出疑問的作爲思想史家的我的課題」。(186)我沒辦法判斷這段譯文與我所說的話是否傳達相同

airiti

的訊息，恐怕從這段話讀出來的並非我所想傳達者、而是不同的訊息吧。看了劉教授的提問便不得不作此想。我在這兒說「與人們一同追問人之生存」，這個追問是指，在現代社會中要從哪裡找出活著的希望？以什麼作為支柱才能活著？並且與那些熱切地追究這些疑問的人們一起提出這些問題。這是作為思想史家之我的思想基礎，站在這個基礎上我的思想史作業是「從我們的思想遺產中找出生存的思想」。我說的「生存的思想」這個表達方式，或許也是產生誤讀的原因。「生存的思想」，是指我們為了活下去的思想，支持我們活下去、給我們活著的希望的思想，這不是在談論在現代仍然還有生命力的思想。所以「從我們的思想遺產中找出生存的思想」，絕對不是挖出倫理學。我絕對不會從東亞最大的思想遺產《論語》中找出倫理學。明治日本從《論語》中讀出「教育敕語」，倫理學者將之展開作為臣民教育。我抱著「與人們一同追問人之生存」的立場，現在與市民們一起閱讀《論語》，過去京都的庶民學者伊藤仁齋從與人們一同追問人之生存的立場讀完《論語》，是故，我將古學先生伊藤仁齋視為我真正的老師。

因為我不夠明確的表達方式所造成的誤讀、誤譯，給劉教授帶來巨大的麻煩，謹此致歉。恐怕教授因誤解而浪費許多時間和精力吧。此文作為賠償，我的回覆仍嫌拙劣，若有機會再次於教授及各位學生面前傳達我的本意，願能針對此文再行補述。

2009/10/29，東京